

Xiandai Guoji Guanxishi Guanjianji



现代国际关系史 管见集

黄正柏 /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PEOPLE'S PRESS

Xiandai Guoji Guanxishi Guanjianji



现代国际关系史 管见集

黄正柏 /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PEOPLE'S PRESS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国际关系史管见集/黄正柏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2

(桂园史学论坛)

ISBN 7-216-04341-3

I. 现…

II. 黄…

III. 国际关系史—现代—文集

IV. D8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1786 号

现代国际关系史管见集

黄正柏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发行:

邮编:430070

印刷:文字六〇三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3.25

字数:354 千字

插页:5

版次: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216-04341-3/D·692

定价:30.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说明和致谢

这里收集的是我二十多年来陆续发表的一些文章(包括一篇译文)。其中有少量曾提交学术会议,尚未正式见诸刊物。它们都是关于现代国际关系史中一些问题的,其他的文章没有收入。

我对国际关系问题的最初兴趣,应该追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那时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实现了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开始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副总理在 1974 年的特别联大上向世界作了系统的宣讲。我们一批同学在老师的指导下,为《人民日报》编辑部编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世界力量划分的论述”,作为我们教学活动的一部分。毕业后留校任教,我到了世界现代史教研室。后来,我先后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国际政治系、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剑桥大学进修和研究。在此期间,我既出于兴趣,也由于领导的安排,一直把国际关系史作为学习的重点,并在从事基础课教学的同时,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国际关系史、冷战史、欧洲一体化等选修课。结合教学工作或是承担的科研课题,我开始对一些问题进行略为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尝试着把所得写成文章发表,渐渐地就有了这本文集中的这些篇章。称之为“管见集”,无非是说它们只是些一孔之见,又比较零散,实在够不上“全面”、“系统”、“深刻”的研究。读者看看里面的文字,可以相信这是“实话实说”。史圣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学史者应当追求的最高境界。然而以世界历史内容之广博深邃,国际关系风云变幻之复杂诡谲,欲求得其真谛,通其变化,成一家之言,实在不是天赋平庸,基础薄弱如我辈者所敢奢望之事。我所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从点滴开始,不好高,不骛远,不求鸿篇巨

制,但愿能管窥蠡测,逐渐收获一二。即使如此,也谈何容易!我自觉并非懒惰,不久又赶上了改革开放后的好时机,但是专业起步较晚,知识积累不够,理论素养贫乏,外文能力有限,使我不时感到力不从心的困扰。文章虽然发表,偶尔也有的在当时引起某种注意,更多的却恐怕难免简单、片面之嫌,或是肤浅、幼稚之讥。第一手文献比较缺乏,对于国际关系史研究而言,亦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凡此种种,不免自觉惶惑,以其难登大雅之堂,本无结集出版的初衷。然而近年来历史系为推动学科建设,组织教师将既有成果集结,纳入《桂园史学论丛》,资助出版,系主任赵国华教授多有鼓励,有此机缘,我便“恭敬不如从命”,不揣浅陋,选编了这本文集。换一个角度想,大抵“敝帚自珍”,也是人之常情。毕竟在这些文章上付出过劳动,集结起来,作为自己学习历程的一个回顾,或许会有助于明确前进方向,也算一件无害有益的事情。在此,我诚恳地欢迎读者、专家的批评和指正。

需要附带说明,这些文章发表于不同时间和刊物,注释格式不一,在收入文集时作了整理和统一,并作了少量删减,对保留的注释尽可能进行了核对。尽管如此,仍然难免疏漏、讹误,也请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文章的内容和观点则保持原貌,只作了少数文字改动。考虑到各篇文章内容的相关性,在文集中没有严格按各篇原来发表的时间顺序来编排。

一个人取得某种成果,哪怕是极微小的成果,总是离不开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在这本文集付梓之际,我要对多年来指导、帮助过我的老师、同事和朋友致谢,包括校内的和校外的、国内的和国外的,他们人数众多,恕我难以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历史系领导对这本文集的编选和出版多有鼓励,并提供资助,湖北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关心本书出版,邹桂芬女士担任责任编辑,付出了辛劳,对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黄正柏

2005年11月7日

试论 20 世纪 20 年代的德国外交	1
阿登纳的欧洲联合政策及早期实施	
——兼谈德国对二战的反思	15
德国问题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	29
20 世纪 50 年代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问题与欧洲国际关系	43
略论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的形成	57
德国统一前两德关系的发展述评	68
略论联邦德国争取统一的努力	80
论统一前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的特点及其原因	97
文论交辉,学苑增色	
——近几年国内关于 1990 年德国统一的研究简述	112
化干戈为玉帛:战后初期法国对德政策的转变及其实现的条件	124
战后初期和 20 世纪 50 年代英国对欧洲联合的政策初探	143
英国欧洲政策的一次重要调整	
——略谈英国申请加入共同市场	159

英国为什么申请十年之后才加入 共同市场	169
战后欧洲联合中“联邦主义” 思潮的初步考察	183
略论战后欧洲联合中的“政府间主义” 及其影响 ——兼及欧洲一体化与国家主权的 关系	205
欧洲理事会的设立及其性质和作用 探析	231
欧洲议会在欧共体立法和决策中地位 和作用的演变及其限度	247
从“辅助性原则”看欧洲一体化与国 家主权的关系	276
斯皮内利的欧洲联邦思想和争取欧 洲联邦的早期努力	289
斯皮内利与 1984 年《欧洲联盟条约 草案》的产生	311
漫谈 20 世纪 30 年代国际关系的几 个问题	329
“九一八”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远东 国际关系的改组	337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第二战场问题	352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欧亚政策	361
从围绕伊拉克战争的欧美之争看“9·11”以来的欧美关系	375
二战以后法德关系和中日关系比较中的思考	384
试论尼赫鲁时期印度的不结盟外交	393
使印度留在英联邦内：1947—1949年英国的军事和政治目标(译文)	411

试论 20 世纪 20 年代的德国外交

20 世纪 20 年代的德国外交，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般著作对这个问题或则语焉不详、略而不谈，或则片面强调德国外交的“反苏”倾向。因此，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粗浅的评述。

—

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外交要达到的目标及所实行的政策和策略，总是由该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国际上的客观形势和力量对比所决定的。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外交目标、政策和策略之形成，也是如此。

20 年代德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极为严峻的。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德国被置于凡尔赛体系的压迫之下。它被迫单独承担战争的罪责，支付巨额赔款；它的海外殖民地被剥夺尽净，它的莱茵领土被协约国占领；它的军备受到限制和监督。总之，称雄一时的德帝国，完全被剥夺了资本主义世界大国的地位和权利，处境孤立，备受压抑。与此同时，战争的结果和赔款重负也摧毁了德国的经济。直到 1923 年，德国国内的局势，对统治阶级来说，也是危机四伏，一团混乱。通货膨胀犹如脱缰之马不可遏止，达到天文数字。经济危机促成阶级矛盾空前激化，革命运动波澜迭起。十一月革命后资产阶级窃取成果而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在内外交困，艰难竭蹶中，勉强支持。垄断资本和容克地主阶级的统治，大有朝不保夕之虑。

德国垄断资本和容克地主阶级，对于这种状况是不能忍受的。战争的失败，并不能使他们立地成佛，其阶级本性、掠夺贪欲，并没有改变。在国内，他们要稳定统治秩序，设法缓和危机。在国际上，他

们要恢复往日德国的“伟大”、“尊严”和“力量”。这是 20 年代德国外交一以贯之的根本的和直接的目标。具体地说，就是要使德国摆脱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和压制，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和权利，重振德国的实力，重新加入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行列。德国的外交政策和策略可以有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

事实上，德国从来就没有甘心接受凡尔赛体系。当凡尔赛条约签字的时候，德国就提出反对。只是由于协约国以战事再起相要挟，德国军队又无力再战，德国才愤然签约，同时声明不承担任何履行条约的道义责任，并且要求作为国际联盟的创始国，即享有与英法平等的地位和权利^①。此后，在执行凡尔赛条约的诸条款时，也多方软拖硬抗，例如在 1920 年斯巴会议、1921 年巴黎会议和伦敦会议上，都是由于协约国的军事和经济压力，德国才接受协约国的要求。对于凡尔赛体系在东方的支柱和法国的盟国波兰，德国恨之人骨，必欲摧毁之而后快。1923 年秋以后，斯特莱斯曼主持外交，实行“履行条约”的政策，一时颇受攻击，似乎他是甘心于受协约国的摆布和充当反苏工具了。然而种种事实表明，他丝毫没有改变德国外交的基本目标。例如，1924 年德国提出加入国际联盟的条件：取得行政院常任理事国席位，参与委任统治，不承担战争责任，修改条约中军备不平等的条款，等等^②。这不正是要全面修改凡尔赛条约又是什么呢？关于斯特莱斯曼外交的真正目标，他自己说得极为明白。1924 年 10 月，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被剥夺了权力，我们必须……重新取得我们的大国地位。”^③1925 年 9 月，他给德国前皇太子的密信中说：

① A. J. Ryder: *Twentieth Century Germany, From Bismarck to Brandt*, N. Y. 1973, p205; 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上卷，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78~79 页。

② 特鲁汉诺夫斯基：《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46 页。

③ W. N. Knight-Patterson: *Germany from Defeat to Conquest 1913—1933*, London, 1945, p352.

“在最近的将来德国外交面临三大任务：首先是赔款问题以德国可以接受的方式解决，保证和平，这是恢复我们的力量的必要前提；其次是保护国外的德意志人即生活于外国异族统治下的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同胞；第三是要调整东部边界，收复但泽、波兰走廊，修改上西里西亚边界。将来还要与德意志人的奥地利合并。”^①1926 年 9 月，他与白里安在图阿里会谈时，则具体表明了他西边的目标是：尽快结束对莱茵兰的占领，归还萨尔及欧本和马尔美第，取消对德国的军备管制^②。至于德国一些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势力，如垄断巨头斯汀纳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首领胡根堡、法西斯党徒希特勒、军官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则是一贯公开叫嚣打倒凡尔赛和复仇。

总之，凡尔赛条约没有解决德帝国主义与协约国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使之更加尖锐深刻而不可调和了。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列宁和斯大林都把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的深刻矛盾作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矛盾之一。列宁说：“德国本身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被征服了的国家，所以它必然要寻找同盟者来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③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德国与协约国之间的矛盾的论断，有助于我们认识 20 年代德国外交的基本目标及其形成的基础。

20 年代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德国外交目标的实现。协约国对苏俄的恐惧和仇视，协约国特别是英法之间在对德政策上的分歧，以及美国的对德政策，都是可资利用的。由于协约国与苏俄之间的矛盾，使协约国总想利用德国作为“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前哨，生怕德国对苏俄一边倒。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写道：“俄国……是一种使我们动

^{① ②} W. N. Knight-Patterson: *Germany from Defeat to Conquest 1913—1933*, p357, pp385—388.

^③ 《列宁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10 页。

摇不定的危险因素，因此必须制定一项针对俄国的安全政策。”^①这一政策的重要内容，就是拉德反苏。张伯伦说：“我们与俄国的关系越是变得困难，我们把德国牢牢地系在西方一边就越是重要。”^②于是，协约国不得不经常在压制德国和扶持拉拢德国这二者之间进行选择。同时，苏俄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反苏统一阵线，也设法利用矛盾，争取与德国改善关系和进行合作。在协约国集团中，法国更多关心自己的“安全”和欧洲霸权，因此而力图使凡尔赛体系永久化，还搞了一个反德的同盟体系，甚至悍然出兵鲁尔，借以使德国这个“世仇”不得翻身。但法国的政策受到英国的掣肘。英国不喜欢法国在欧洲大陆称王称霸。而热衷于扶德抑法，维持均势。在英国看来，“一旦德国垮了，欧洲均势就会消失”，所以，“1914年对德国适用的那些论点，现在则适用于法国了。当时的三国同盟有法俄协约来平衡，而今天的法国和小协约国却没有什么东西来加以平衡”^③。因此，英国反对索取过多的赔款，主张尽早让德国加入国联，让德国参加“复兴欧洲”、“开发俄国”的计划。到1924年工党内阁，麦克唐纳公开谴责凡尔赛条约，“修改条约甚至成了英国的官方政策”^④。美国为了便于对欧洲实行经济渗透，也希望德国稳定和恢复。有鉴于此，德国外长西蒙斯说：“我们必须考虑敌人的战略。一方的人要挤牛奶，另一方的人要宰牛的头，那些主张挤奶的人必然会和我们签订协定的。”^⑤1925年9月，斯特莱斯曼写道：“我们必须取下颈上的锁链，为此德国的政策，正如梅特涅谈到的1809年后的奥地利一样，无疑应是一

① 维戈兹基：《外交史》第三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63页。

② Gordon A. Craig: *Germany 1866—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521.

③ W. N. Knight-Patterson: *Germany from Defeat to Conquest 1913—1933*, pp345—346.

④ A. J. Ryder: *Twentieth Century Germany, From Bismarck to Brandt*, p207.

⑤ 鲍爵姆金：《世界外交史》第四分册，五十年代出版社，第89页。

种‘运用策略’和避免作重大决定的政策。”①巧妙地利用协约国与苏俄之间和协约国之间的矛盾，力求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玩弄平衡，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避免作出明确的决定和承诺，从而左右逢源，摆脱孤立，争得主动，这些成为德国 20 年代外交的重要策略和突出特点。尤其在斯特莱斯曼主持外交期间，对此运用得娴熟而有效。

二

20 年代德国外交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前一阶段，从战败后到 1923 年，德国几经反复，走上了结纳苏俄以摆脱孤立并抗衡协约国的道路。后一阶段，德国与协约国改善了关系，并继续与苏联合作，从而恢复了德国的地位和“力量”。

德国统治集团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对和敌视，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中许多人本不倾向于对苏友好合作；社会民主党是强烈反苏，主张西方政策的；国防军鲁登道夫、冯·德·哥尔茨集团认为对苏俄除了彻底的反布尔什维克之外，谈不上任何政策；工商界中的极右势力认为，应在俄国恢复君主制来开辟俄国的市场，否则谈不上对俄合作；签订了拉巴洛条约的拉特瑙，原来也是“西方派”，主张“履行条约”，并通过大托拉斯之间的国际合作，与协约国“恢复关系”②；即使是后来担任驻苏大使、力主德苏合作的布罗克多夫——兰曹，原本也是“毫不隐讳的”、“公开宣称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主张德国中立，反对“结盟政策”，直到拉巴洛条约后他受命担任驻苏大使前夕，仍然反对“单独面向东方的政策”③。因此，德国统治集团寄希望于

① W. N. Knight-Patterson: *Germany from Defeat to Conquest 1913—1933*, p364.

② ③ 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 3,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London, 1978, pp306—308, 437—438; W. N. Knight-Patterson: *Germany from Defeat to Conquest 1913—1933*, p296.

协约国的宽容，竭力表明德国可以充当抵制“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让东线德军奉协约国之命驻留，其中大部分参加了白俄的反苏冒险，并得到了重工业界的资助。拉特瑙曾力图实行“履行条约”的政策，不仅使德国接受了协约国规定的赔款总额，而且还与法国代表卢舍进行过关于组织全欧电气托拉斯的会谈。1921年10月，他与卢舍达成了增加赔款的实物支付以代替黄金支付、有利于德国的“威斯巴登协议”。热那亚会议前，德国又一再声言，只要减轻赔款条件，给以贷款，就可以使德国大量购买商品，满足英国的出口需要。拉特瑙还亲自赴英国寻求贷款，积极争取参加协约国拟制的组织国际财团“复兴欧洲”和“开发俄国”的计划，并再次暗示德国可以抵制“布尔什维主义”^①。在热那亚会议上，德国表示愿意与协约国妥协合作，拉特瑙为此被人攻击为法国的同盟者。总而言之，德国统治集团寄希望于协约国或者中立，德苏共处和合作的道路，还没有打开。

但是客观形势的发展逻辑为自己开辟着道路。从根本上讲，与苏俄共处和合作，符合德国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德国的垄断资本，特别是钢铁等重工业巨头，由于在西方和海外市场上被排挤出来了，十分垂涎于苏俄的广大市场和丰富的资源。且德俄之间素有传统的经济联系，德国历来从中得益甚大。德国另一实力集团军人集团，为了逃避凡尔赛对德国军备的限制和监督，渴望有朝一日洗雪战败之耻，以谢克特为代表的多数人主张与苏俄合作^②。德国还希望在波兰问题上得到苏俄的合作^③。一言以蔽之，德国认为苏俄是一个可以摧毁“凡尔赛指令”的力量，一个有助于恢复德国的地位的阶梯。

所以，在德国工业、军事、外交各界中，自始就有比较强大的主张与苏俄合作的力量。从1919年起，他们就开始同苏方人士接触，试

^{① ②} 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 3, pp357—359, 306—307, 310—311.

^③ A. J. Ryder, *Twentieth Century Germany, From Bismarck to Brandt*, p222.

探与苏俄合作(包括军事合作)的可能性^①。1919 年秋德国拒绝按协约国的要求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得到国会各党派不同程度的赞同^②。拉特瑙在寻求与协约国“恢复关系”的同时,也看到德苏间的联系是“决定德国未来政治和经济命运”的问题,德苏利益“存在着自然的共同性”,德国可以“利用东欧的政治条件,获得某些不大的独立和自由,以便自己不受最沉重的剥夺和压迫”^③。

随着苏俄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反苏十字军”的失败,随着与协约国“恢复关系”的努力迭受挫折,与苏俄共处合作的倾向,渐占上风。协约国特别是法国不顾拉特瑙“恢复关系”的努力,仍然对德国屡施压力。法国坚决反对德国加入国联,并以退出国联相要挟^④。威斯巴登协议遭到法国工业界反对而成为废纸。拉特瑙赴英寻求贷款也无结果。法国普恩加莱政府坚持由协约国控制德国财政,占领德国一部分领土以提供赔款的“生产保证”。正当拉特瑙力争与协约国合作来“复兴欧洲”、“开发俄国”的时候,英法两国商定,在热那亚会议上不对德国的赔款和条约义务作任何的讨论和变动。法国代表在热那亚会议上竭力阻止各国与德国进行新的接触。这是因为这时战争造成的恶感还十分强烈,英国对德国也还缺乏信任,其立场又往往为法国的强硬政策抵消,更兼德国人没有无条件“履行和约”,与协约国“恢复关系”的努力一时难以取得明显进展。但与苏俄“恢复关系”的进程却要快一些。苏俄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干涉而巍然屹立,这已是不可怀疑的事实,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梦想已经破灭。卡普政变后,鲁登道夫、哥尔茨集团失势。1920 年苏波战争,红军一度进抵华沙,德国企图借此摧毁波兰这个凡尔赛条约的支柱,乃开始向苏俄提出讨

① ② 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 3, pp315—316, 307.

③ 伊·费·伊瓦辛:《苏联外交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82 页。

④ 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上卷,第 134 页。

论恢复正常外交关系^①。1921年德苏缔结贸易协定，德国承认苏俄代表团是在德国惟一的俄国代表，撤销了迄今为止对于在柏林的白俄组织的承认，这是“反苏十字军”的正式葬礼，是德国对苏政策的重要发展^②。1921年协约国对上西里西亚实行的分割，使德国大为不满，并对那些一直敌视苏俄，对协约国寄予希望的外交界人士产生了影响，强烈反苏的外交部东方司长贝伦特辞职，主张与苏俄合作的马尔参接任，德苏接近的道路进一步扫清^③。当1921年底1922年初拉特瑙还在考虑与西方财团共同行动时，总理维尔特、人民党领袖斯特莱斯曼，以及马尔参等，却反对通过财团进行对苏贸易，反对德国成为一个敌视苏俄的财团的成员，主张单独进行对苏贸易^④。

1922年热那亚会议，在英法事先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德国修改条约无望，处境孤立。又闻听协约国可能与苏俄达成协议，深恐这会使德国陷于更深的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外交终于迈出了重大一步，签署了早已基本谈妥但德方拖延签字的协议，这就是拉巴洛条约。条约规定，两国恢复外交和领事关系，相互放弃各项赔偿要求，按最惠国待遇发展经济关系。这是备受压抑的德国与一个大国签订的第一项平等条约，它提高了德国的政治地位，改善了德国的经济处境，结束了德国在国际上的孤立。此后一个时期，德苏关系发展很快。仅以贸易为例，到1922年底，德国对苏出口增长了一倍多，而进口则增长十三倍多。列宁说得十分正确：“国际形势的利害关系促使它违背自己的愿望而同苏维埃俄国讲和。”^⑤

这一时期德国与协约国的关系是恶化的。特别是拉巴洛条约引起了轩然大波。英法都不喜欢德苏合作，把德国开除出了热那亚会议的政治委员会。法国更加担心“安全”，积极准备施加更大的压力，英国也减少了对德国的同情。这时斯汀纳斯又发出挑衅性的言论，

^{① ② ③ ④} 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 3, pp324—325, 339, 365, 369—370.

^⑤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31页。

表示即使冒鲁尔被占的风险，德国也不再支付赔款。1922 年维尔特等向英、法寻求贷款，古诺政府于 1922 年 12 月通过美国政府提出缔结边界保证条约企图挽回主动，均无效果。而后，古诺政府采取了抵抗政策，于 1923 年提出一个“给人印象不深的”赔款数额，而且要求提供贷款、恢复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平等地位、保证撤出杜塞尔多夫等城市和莱茵兰，作为支付赔款的条件。于是矛盾激化，导致法比军队占领鲁尔。德国宣布消极抵抗，与法国关系空前紧张，战争又似乎一触即发。鲁尔危机对欧洲和德国形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古诺政府下台，斯特莱斯曼主持外交，从此德国外交进入了新的阶段。

三

鲁尔危机和消极抵抗，使德国经济状况更为恶化，德国人民反对法国占领鲁尔和反对本国统治阶级的革命运动又掀起了高潮。这使德国统治集团进一步看到了德国的虚弱，看到他们统治地位的不稳，看到仅仅与苏俄合作来抵制协约国的政策的不足，害怕形势继续如此发展会使德国“布尔什维克化”。于是“履行和约”，徐图进展，又显得必要了。原曾不遗余力地反对签署凡尔赛条约，反对 1320 亿金马克赔款的斯特莱斯曼，现在则说“眼下惟一可行的政策就是承认凡尔赛所加的义务”，“多付十亿少付十亿决不是我们的生死问题，莱因和鲁尔才是我们的生死问题”^①。拉特瑙曾力图实行的“履行和约”政策，重新成为德国的官方政策，由斯特莱斯曼继续实行。

这时候国际形势有了新的发展。鲁尔危机后，英法分歧表面化。英国公开谴责法国的行动，英美银行抛售法国货币，使法郎行情更加下跌，法国财政进一步恶化。法国原来对占领鲁尔抱有幻想的许多人，改变了对普恩加莱强硬政策的态度，加之占领费用庞大，得不偿失。普恩加莱政府因在国内外都陷于孤立而倒台。鲁尔危机后欧洲

^① 鲍爵姆金：《世界外交史》第四分册，第 237 页。